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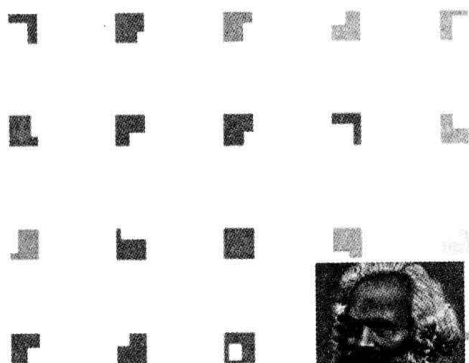
*Study on
Marx's Labor
Division Thought*

马克思 分工思想研究

王虎学/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Study on
Marx's Labor
Division Thought*

马克思 分工思想研究

王虎学/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分工思想研究 / 王虎学著.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6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

ISBN 978-7-5117-0495-5

I. ①马…

II. ①王…

III. ①马克思主义 - 社会分工 - 思想评论

IV. ①A811.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8676 号

马克思分工思想研究

责任编辑 王丽芳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 (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 (总编室) (010)52612349 (编辑室)
(010)66130345 (发行部) (010)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010)66161011 (团购部) (010)52612332 (网络销售)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26 千字

印 张 26.25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

主 编/杨金海

副主编/李惠斌 鲁 路

总序： 开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新境界

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是于 1899 年传入中国的。从那时起，中国学者已经开始了对他们思想的研究。但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中国和世界命运的思想武器并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则是从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等人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在我国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建国前的初步研究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的系统研究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入研究阶段。

经过一代又一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的成果。如黄楠森、施德福、宋一秀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三卷本），黄楠森、庄福龄、林利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庄福龄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四卷本），余源培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叶汝贤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 1837 - 1949》，杨春贵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教程》等。其中，黄楠森、庄福龄、林利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直到今天还是世界上最大部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

除了上述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之外，学者们还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文本进行个案研究，如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以及列宁的《哲学笔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经典文本进行细致的研究和阐述。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中年、晚年不同时期思想进行了分期性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进行了多侧面的纵向研究，如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学思想、实践思想、社会发展理论等。

通过长期的研究探索,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至少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宏观性,即在宏观的层面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总体性研究,包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生平事业,某一著作的时代背景、主要思想以及各种著作的内在联系等,力图在宏观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二是学科性,即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新闻学、美学、历史学、军事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多方面进行研究。三是规范性,即各个方面、各个学科的研究都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具有比较稳定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规范。四是现实性,即紧密联系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进行研究,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五是独立性,即主要以经典著作的中文版本为基础,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这些特点实际上也是我们在研究中自觉或不自觉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我们取得上述丰富研究成果的宝贵经验。

这些学术成果和研究经验对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起了重要作用,为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乃至整个现代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等学科建设、教材建设以及队伍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就需要认真总结和学习历史经验,同时以学术界前辈的学术成果和研究经验为新的历史起点,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开创新的学术境界。为此,我们至少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是应当加强宇观研究,即以传统的宏观研究为起点,借用物理学的思维方法,大力开拓研究空间,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宇观领域进军。这也就是说,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本研究,同时又要超越于文本之上,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元问题,包括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有哪些等。我国理论界有许多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在这些元问题上大家缺乏统一认识。只有把这些元问题研究清楚了,才能在具体问题上统一认识,把理论研究推进到新的境界。

二是应当加强微观研究,即同样借用物理学的思维方法,大力开拓

研究空间，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微观领域进军。这也就是说，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本研究，深入研究经典著作中所蕴涵的话语体系，对经典作家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做仔细的梳理，弄清其来龙去脉，形成一系列专题性的研究成果。例如，可以对经典作家关于生产力、社会结构、社会有机体、所有制、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文化、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政治文明等基本概念和基本观点进行专题研究。特别是要对那些过去不太重视而今天看来对我们特别具有意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观点，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思想、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思想等进行深入研究，这样才能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时代性和生命力，更好地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功能。

三是应当深化文本和版本的研究。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本研究主要集中在几部成型的著作上，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今天看来，经典文本研究的范围有待拓展，既应该包括成型的著作，也应该包括尚未成型的手稿、笔记、信札等。更为重要的是，随着 MEGA2 版的陆续出版，一批新文本将随之面世，加强对这些文本的研究，将会使我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理解更为准确。同时，应当对经典著作的版本进行考证式研究。比如要弄清某本著作中文版的翻译演变过程，它与 MEGA 版的关系等，都需要进行深入的版本研究。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学者对建国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情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三种主要外文版本（德文版、英文版、俄文版）和历史考证版进行了初步研究。还有一些学者对《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单行本著作的诸种中文版本进行了考证式的梳理。但就总体来看，这项工作无论是就整体进度、覆盖广度还是就研究深度而言，都还需要继续加强。只有通过对文本和版本的考据学、解释学研究，才能深入把握经典作家思想的演变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历史进程。

四是应当深入开展比较研究。以往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的研究基本上以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为主要研究资料和研究对象。今天看来，应当加强对经典著作的原文本与中文本的比较研究。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辨清哪些是经典作家本来的观点，哪些是在版本转化过程中附加给经典作家的观点，哪些是被遗漏掉的重要信息。可喜的是，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已经在自觉地进行这方面的比较研

究。可以说，随着 MEGA2 版以及其他相关新文献的不断引进，以及我国新一代学者外文研究能力的提高，原文本研究以及各种文本的比较研究将会进一步展开，这将会有力地促进经典著作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深入，在研究方法、对象和内容体系等方面也必将取得新的成果。

正是出于以上考虑，我们中央编译局的部分学者愿和国内同仁一道，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并由中央编译出版社陆续推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系列成果。

杨金海

2007 年 5 月 18 日

于北京西单

前 言

分工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现象，分工也是一个现实的理论问题。在分工思想史上，经济学家们首先谈到了分工，却没有能力向它提出质疑，马克思第一次对分工问题作出了全面、科学而系统的分析和解答。直接而言，分工是一个经济学范畴，但分工更是一个具有历史观意义和哲学意义的范畴，在马克思那里，分工不仅是“政治经济学一切范畴的范畴”，而且是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深处的核心范畴，因为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本书在借鉴、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解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力图挖掘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分工思想。从结构框架来看，本书由“导论”、五章内容和“余论”组成，从马克思分工思想的历史发展、马克思分工思想的逻辑进程、分工的基本规定性与双重意蕴、马克思分工思想的理论方位、马克思分工思想的当代阐释五个方面试图完整地再现马克思的分工思想。

第一章：马克思分工思想的历史发展。在批判地继承前人分工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分工思想。尽管马克思并没有留下专论分工的系统性著作，但马克思对于分工的研究几乎贯穿于其理论研究的全过程。从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分工就引起了马克思的兴趣。随后仅隔一年之久，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完成的、作为唯物史观诞生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工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范畴得到了正面阐述。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论战性著作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超历史”的分工概念的过程中丰富了分工的内涵。后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分工进行具体、实证的分析 and 研究，马克思进一步补充、完善并发展了其分工思想。

第二章：马克思分工思想的逻辑进程。从分工的自然发生到分工的消灭，从异化到世界历史、再到共产主义，逻辑地再现了马克思分工思

想生成与嬗变的现实运动。在这里，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也是不断转换的。首先，“异化”构成了分工的初始论域。马克思不仅在追问异化劳动的根源时发现了分工，而且还在对国民经济学批判中阐明了分工的本质。其次，“世界历史”敞开了分工的崭新地平。马克思认识到并从分工中引申出了对于社会历史的科学批判话语，他同时阐明了分工向世界范围扩展的“全球化”效应及其“现代性”后果。最后，“共产主义”宣告了分工的未来命运。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才能存在的共产主义，既是对“历史之谜”的解答，也是对分工未来命运的自觉。

第三章：分工的基本规定性与双重意蕴。在梳理马克思分工思想的历史发展及其逻辑进程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应该回到“分工”本身去。分工是一个历史范畴，分工的基本规定性蕴含在三个重要的命题之中：分工是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分工是私有制的“同义语”；分工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抽象”或“理论表现”。分工也是一个现实范畴，具有“双重意蕴”：分工是经济学与哲学“双重视域”的融合；分工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属性”；分工包含着“分工一般”与“分工特殊”的“双重逻辑”；分工的“双重效应”表现为分工既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第四章：马克思分工思想的理论方位。马克思的分工思想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一问题是本文的重点。须知，马克思从来都不是就分工而单论分工的，而总是将分工与社会历史的变迁以及人的生存方式的转换问题联系起来考察的，因此，要准确把握分工思想的理论方位，不妨将分工与这些大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首先是分工与唯物史观。分工是马克思从哲学转向经济学研究的标志性范畴，但马克思并没有将分工最终引向纯粹的经济学研究，而是在以分工为标志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最终创立了唯物史观。其次是分工与社会形态。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就是所有制发展的不同阶段。只有从分工出发，才能真正洞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揭示出社会形态演进的“自然历史过程”，建构起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再次是分工与人类文明。“真正的分工”即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杠杆，马克思和恩格斯着眼于“真正的分工”，发现了“意识”，并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尽管马克思并没有将“意识”提升为“原初”历史的构成因素，但他也未曾将“意识”看作经济的纯粹附属物，而是将“意识”的发现以及随之而出现的

“自由的精神生产”视为人类文明的象征。而“文明的辩证法”所揭示的正是文明社会内部“文明与阶级”对立和矛盾的本质。最后是分工与人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具有一种“本体论”的意蕴，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论及分工问题时，马克思总是将分工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实际上，马克思的分工思想中内在地包含着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和人的解放问题。基于对资本主义分工条件下人的生存境遇的辩证分析，马克思不仅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理想目标，并指明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条件。

第五章：马克思分工思想的当代阐释。分工本身与“人的分化”和“社会的分化”内在相通，分工的发展应该从分化的视角去理解。有分化就有整合。人的社会性存在、人的需要决定了人注定要进行一种分工活动，人也是由分化产生的。如果说人凭借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实现自我分化与整合，进而实现自身的“发展”的话，那么，现代社会也正是基于分化与整合的辩证形式和矛盾运动而向前“发展”的。从分化与整合的角度来阐释分工，就要全面地、辩证地看待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化的二重性，同时，既要看到分工的“社会分化”效应，又要看到分工的“社会整合”功能。

马克思的分工思想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现代社会依然熠熠发光。在重读马克思、重释马克思分工思想的基础上，本书最后将分工与秩序问题勾连起来，指出现代社会的发展应该指向一种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这无论是对于坚持并发展马克思的分工思想，还是对于行进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社会而言，都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

目 录

总序：开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新境界	1
前言	1
导论 分工论——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处	1
一、研究思路	2
二、研究意义	5
三、研究现状	9
四、研究方法	23
第一章 马克思分工思想的历史发展	25
第一节 马克思分工思想的理论探源	25
一、古典古代思想家的天才创见：以柏拉图为代表	26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奠基：以斯密为代表	32
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天才设想：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	40
四、德国古典哲学的方法论启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	43
第二节 马克思分工思想的发展轨迹	51
一、分工的发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分工”	52
二、分工的形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	58
三、分工的丰富：《哲学的贫困》中的“分工”	64
四、分工的发展：《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分工”	70

第二章 马克思分工思想的逻辑进程	85
第一节 异化：分工的初始论域	85
一、异化劳动及其根源探析	86
二、国民经济学批判与分工的本质	92
第二节 世界历史：分工的崭新地平	97
一、分工与社会批判话语的形成	97
二、分工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104
第三节 共产主义：分工的未来命运	113
一、分工的自然发生及其扩展	114
二、“历史之谜”的自觉与解答	122
三、“消灭分工”的真正意涵	128
第三章 分工的基本规定性与双重意蕴	137
第一节 分工的基本规定性	137
一、分工是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	138
二、分工是私有制的“同义语”	145
三、分工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	152
第二节 分工的双重意蕴	157
一、分工的双重视域：经济学与哲学的融合	158
二、分工的双重属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	161
三、分工的双重逻辑：分工一般与分工特殊的交织	168
四、分工的双重效应：历史进步的动力与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176
第四章 马克思分工思想的理论方位	185
第一节 分工与唯物史观	185
一、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批判	187
二、唯物史观的正名与革命	195
三、“物质生产”的剥离与奠基	209

第二节 分工与社会形态	218
一、分工与“社会类型学”	220
二、分工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	228
三、社会形态的演进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236
第三节 分工与人类文明	246
一、“真正的分工”：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	248
二、分工与“意识”的发现	258
三、分工与“自由的精神生产”	269
四、分工与“文明的辩证法”	279
第四节 分工与人的全面发展	296
一、分工与“现实的人不是人”	298
二、“缩小的人”与“全面的人”	307
三、“人的全面发展”及其实现条件	316
 第五章 马克思分工思想的当代阐释	329
第一节 分工与人的自我分化—整合	330
一、“人类注定要进行一种分工活动”	331
二、人的自我分化与整合	338
第二节 分工与现代社会的分化—整合	344
一、“从社会分化的视角理解分工”	346
二、社会整合：分工的“真正功能”	355
三、分化与整合：现代社会的特质	366
 余论 分工与一种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	379
 参考文献	389
 后 记	403

导论 分工论——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处

分工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现象，分工也是一个现实的理论问题，自古以来引起了许多思想家的注意和重视，马克思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那么，什么是分工呢？分工一词的英文形式是 Division of Labour，从其字面意思来看，可直译为“劳动的划分”。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分工即“劳动的分化”^①，“从某种意义上说，分工无非是并存劳动”^②。可见，分工与劳动如影随形，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也说：“在劳动过程中人们相互之间发生一定的关系，进行或简或繁的分工。”^③实际上，我们经常使用的诸如社会分工、劳动分工这类术语并不存在本质区别，而仅仅是不同学科在不同语境和习惯中对分工的不同描述和称谓而已，因此就会出现“劳动的社会分工”或“社会劳动的分工”^④这类同义语。事实上，正如列宁所说：“就我的判断，马克思也有时讲‘社会分工’，有时只讲分工”^⑤。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与分工是一切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有关“劳动和分工”之类的知识乃是“政治经济学的起码知识”^⑥。须知，社会历史的奥秘都浓缩在劳动中，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⑦。同样，“分工的发现”使马克思跳出了对历史进行“循环论证”的圈子，从而解答了“历史之谜”，在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9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2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2—303页。

⑤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21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分工及其发展史也是理解全部社会史的一把钥匙。

一、研究思路

（一）从“分工的观点”理解历史唯物主义

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①。如果把马克思所建构起来的社会历史观比作一幢理论大厦的话，那么，对于试图走进马克思、理解马克思的人来说，应该从什么样的视角和怎样的观点出发最容易发现并理解其中蕴含的奥秘呢？或者说，进入历史唯物主义大厦的入口究竟在哪里呢？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入口呢？也许，这是每一个研习马克思的人在自身的学习和研究中都会想到或提出的一个问题，实质上这也是一个关系到如何阐释和理解马克思或者说以怎样的路径进入马克思哲学的重大问题。如果说我们对此还有些迷惑和不解的话，我们就来听听经典作家的教导吧！

1890年10月27日，在致康·施密特的信中，恩格斯明确指出：“我基本上也已经回答了您关于整个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②这表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及其所涉及的纷繁复杂的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最易切入，最易理解。当然，我们不能就此断言，从分工的观点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理解马克思的唯一路径和绝对命令，但是，我们也决不能否认从分工的观点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可能性和科学性，而必须充分认识并积极肯定分工的观点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地位。对此，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巴加图利亚在其《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这本小册子中曾指出：当马克思注意到分工问题的时候，“马克思似乎预感到了正是这方面对历史和社会规律性的进一步探索将会获得特别重大的成果……正是经过对分工的分析，马克思在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方面就迈出了下一步，而且是有决定意义的一步”^③。

①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86页。

③ [苏]巴加图利亚：《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陆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

问题是，在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分工视角尚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虽然学界普遍认为分工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范畴之一，但是在我国原有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大都没有或很少论及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因此，有学者指出：“我们应该把这类因素挖掘出来，补充进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①。虽然学界一致认可分工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过程中曾经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分工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有学者指出：“只有以分工为起点和逻辑主线，才能建立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但十分遗憾的是，“在我们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这个范畴却被遗漏了”^②。

因此，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处，就必须重视分工研究，沿着马克思所开启的道路继续前行。如果说恩格斯为我们指明了透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工视角的话，反过来，我们还应该对分工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

（二）以分工为起点“回到马克思”

实际上，从“分工的观点”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深处，必然要求回到马克思，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而且，对于试图建立更加合理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建构“深度模式”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而言，我们必须对马克思及其著作进行“深度耕犁”，因此有必要再次重申“回到马克思”这一划时代的口号。我们认为：“回到马克思”的研究要义就是要返回到马克思哲学的文本，通过对马克思原著的重新研读和阐释，修正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面和错误理解，正确地把握其思想内蕴和精神实质，并将马克思思想理论中合乎时代需要的方面提到首位，给予开掘和弘扬，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寻找本真的理论原点。^③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回到马克思，“并不是回到马克思的书本，也不是简单地重复马克思说过的原话，我们是背负着今天时代的一切思想成果与马克思的逻辑视界历史地融合在一起的。我们回到马克思，既是要寻找一个真实的起点，同时也要以今天最新的社

① 赵家祥：《从分工的社会作用看分工的本质》，载《河北学刊》，1990年第2期。

② 秦庆武：《应以分工为起点和逻辑主线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载《江苏社会科学》，1986年第12期。

③ 张曙光、王虎学、毛剑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年研究述评》，载《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